

译笔求道路漫漫

草嬰

海上谈艺录

金波 司徒伟智著
上海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海上谈艺录丛书

译笔求道路漫漫

金波 司徒伟智 著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图书在版目录(CIP)数据

译笔求道路漫漫 / 金波, 司徒伟智著. — 上海: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2009.9

(海上谈艺录)

ISBN 978-7-5452-0458-2

I.①译… II.①金… ②司… III.①草婴—评传 IV.①K8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3518号

“海上谈艺录”丛书获  资助

策 划 杨益萍 张晓敏

统 筹 邹 平 王 刚

责任编辑 许 铭

特约编辑 孙建成

封面设计 姜 明

技术编辑 李 荀 孙宗霄

丛 书 名 海上谈艺录

书 名 译笔求道路漫漫

著 者 金 波 司徒伟智

出版发行 上海锦绣文章出版社

地 址 上海市长乐路672弄33号 (邮编200040)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锦佳装璜印刷发展公司

规 格 787×1092 1/16

印 张 11.25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2-0458-2/J.264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装单位联系 021-56401314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海上谈艺录”丛书编辑委员会

编委会主任 王仲伟

编委会副主任 陈 东 吴贻弓 杨益萍

编委会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仲伟 王汝刚 江明惇 陈 东 迟志刚

张元明 张建亚 张晓敏 陆在易 吴贻弓

杨益萍 何 麟 尚长荣 周慧珺 施大畏

胡国强 凌桂明 程海宝 穆端正 戴炜栋

策 划 杨益萍 张晓敏
统 筹 邹 平 王 刚

目 录

艺术访谈

与草婴面对面	(003)
--------------	-------

艺术传评

第一章 草萌沃土	(017)
第二章 时代大学	(037)
第三章 建设之歌	(046)
第四章 引领新风	(056)
第五章 倾力译肖	(067)
第六章 时穷节现	(086)
第七章 艰辛跋涉	(097)
第八章 攀越峻峰	(114)
第九章 思想之光	(131)
第十章 山高水长	(145)

附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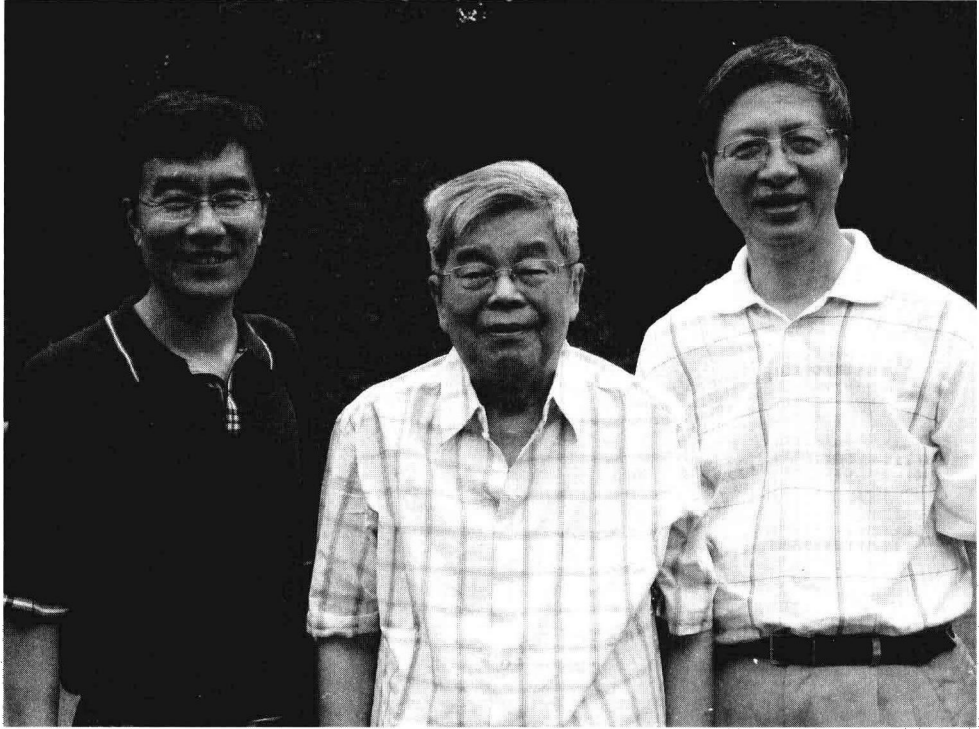
从艺大事记	(159)
后 记	(167)

艺术访谈



通过“文化大革命”，我越来越清楚，在历史上少数人统治多数人，少数人以自己的意志决定多数人的命运，这是人类苦难的根源，也是人类无数次浩劫的原因。要结束这样的悲剧，首先必须培养人与人之间的美好感情，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宣扬人与人之间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

——草婴



草嬰（中）和金波（左）、司徒偉智（右）合影。

与草婴面对面

时间·2009年3月

地点·上海华东医院

被采访人·草婴

采访人·金波 司徒伟智

我们两个都是新闻记者出身，采访过的各色人等也不算少，但是要介绍一位在外语天地里纵横驰骋的翻译大家却实在是平生头一遭。

2009年2月初，上海市文联邹平先生打来电话，邀约我俩写作丛中介绍草婴的这一本时，我们委实感到突然。说实话，当时我们一则以喜，就是深感任务光荣；一则以惊，就是我俩俄语皆不通，如何胜任得了？

跟草婴先生见面后，我们开始坦然且自信了。我们面对着的，可是中国继英国文豪莎士比亚译者朱生豪、法国文豪巴尔扎克译者傅雷之后，潜心翻译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与肖洛霍夫的作品而广受读者爱戴的又一位译坛泰斗哟！而他的谈话却一如他的翻译风格那样诚实正直、富于涵养，又一心为读者着想。记得他从前说过：“我要努力在读者与托尔斯泰之间架一座桥，并且把这座桥造得平坦、宽阔，让人轻松走来不觉得累。”其实，无论何时何地何种场合，他都担当起一座便利读者学习交流之“桥”。最令人感动的，就是对于我们的请教，哪怕是某些几近外行、很不专业的问题，先生总是耐心地讲解、中肯地分析。我们发现，眼前这位大翻译家，原来对自己的读者是不会挑剔的。读者再粗浅，他也宽容，也厚爱，唯此才是大家的风格。

我们明白了，当一本解读艺术家的专著的作者，和当记者、当读者相通，关键在于认真学习对象、研究对象，就像当年阅读草婴一部部作品一样，才能够领略草婴一条完整的艺术道路。虽云作者，仍属读者。我们就作为两名读者，且代表着身后无数喜爱草婴作品的读者，走近这位可敬的老人。

3月1日下午，阳光明媚。“吹面不寒杨柳风”，沪西一带市区已是冬尽春来的

样儿。我俩将近3点在延安西路的华东医院东楼底层大堂会合，随即上电梯，直至14楼——草婴病房。看到草婴在靠窗的那张床上，正微微入睡。见客人来，陪护工轻轻摇醒了他。他似乎已经知道我们的到访原因，只稍作沟通便已了然，遂请我俩坐在沙发上交谈。

我们是第一次见到草婴先生。他斜躺着，仪态安详，看上去头发已经全白了，比以往在电视屏幕上、报刊新闻照片上所见的花白头发的草婴，显得更老些。却不见有明显病态，只是略有些倦容，精神不够振作而已，大概是躺得太久缺乏活动之故。

正交谈间，盛天民进来了。经探询，得知她原本是上海辞书出版社的编辑，已经离休。——噢，都是新闻出版界的“大邻居”，彼此聊上几句，原来共同相熟的友人多着哩，大家的共同语言自然也就多起来了。草婴和盛天民已经是六十余年的夫妻，患难与共，一路走来，加上都是文化圈内的，后者对于前者相知之深可以想见。有这部解读草婴翻译艺术的“活字典”在侧，对于我们的采访来说，可谓天大的裨益。提供事实，理清头绪，矫正数据……在后来的采访中，她果真就是如此一再给予我们帮助。实在该感激她。

在这天的采访当中，又来了个值得感激的人，他就是章海陵。此前我们读过这位中年学者的文章，得悉他对于俄罗斯文学有较深的研究。据盛天民介绍：“他这几天在上海，几乎是每天都来医院探望草婴的。草婴是他的硕士论文的导师。”他下功夫研究过托尔斯泰，现在也研究草婴。他的文章明确提出，中国“改革文学”的渊源之一，是翻译家草婴20世纪50年代的译作《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他认为，这是草婴生涯中极其值得关注的亮点。有章海陵一起参与，我们的采访更加丰富、深入而有效率。谈了两个小时，我们才告退。

隔了两天，3月3日，我们继续采访。我们是根据事先约定，于4点整到达的。依然是个晴朗的早春下午。太阳已经下山，窗前却还算亮堂。盛天民也在。草婴兴致勃勃。我们又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受益良多。

下面的对话文字，主要就是根据这两次采访的记录整理而成。

作者：草婴先生，您现在的身体状况还好吗？读者都很关心您呢。

草婴：不敢说好，已经在医院住了将近五个月了。老年病症，康复起来慢。而且“文革”中的骨折老伤，又发作了。

作者：噢，您曾经骨折过？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发生的？

草婴：1975年初，我已经从“五七干校”回到上海，在出版社劳动。我被命令去工地扛水泥包，当时我的体重总共九十余斤，却要扛一百斤的水泥包。我到卡

车边等候搬运，人还没有站稳，车上人一松手，水泥包压到我身上，我只听得自己身上发出“咯嗒”一声，就倒在地上昏迷了过去，后被送到工地附近的瑞金医院，诊断结果是第十二节胸椎压缩性骨折，不好用绷带，也没有药。加之因为我当时是“牛鬼蛇神”，没有资格住院。医生要我回家去，一动不动地在木板上躺半年，等待腰骨自然愈合。我就只能保持一个姿势躺在木板上，吃喝拉撒都在上面，稍微动一动就痛得钻心。过了一年光景才愈合起来，可以行走，但也就落下老伤。

作者：为何当时要批判您？您是个翻译家，从来没有兴趣搞什么政治活动，不会去招惹谁呀。

草婴：是呀，查不到我什么现行问题。但那个时代，就是这样没道理好讲。

20世纪50年代，我主要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包括《被开垦的处女地》、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和《一个人的遭遇》等。在苏联文学家中，肖洛霍夫被公认为托尔斯泰的继承人，说他在写作技巧上继承了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在思想上继承了托尔斯泰的人道主义。到了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文学被封杀，我翻译肖洛霍夫作品也从受赞扬转变为受批判。“文革”来了，江青把肖洛霍夫定性为“苏联修正主义文艺鼻祖”，《静静的顿河》、《一个人的遭遇》都成了“修正主义的大毒草”，我就升格啦，被说成是肖洛霍夫的吹鼓手，肖洛霍夫在中国的代理人，成为运动最早冲击的对象。被关押一年后，就转为监管劳教对象——两次出生入死包括这次严重骨折，都在这期间发生。

作者：太惨了。为了翻译，吃了这么多的苦头，您后悔过吗？

草婴：不管外界怎么样，我就知道做好外国文学翻译，对国家民众有利。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为什么要后悔呢？

作者：选择人生道路，只看正确与否，不顾功利与否。草婴先生，您做到这一条，真不简单。据我们了解，您从抗战时期开始就跟中共地下党密切合作，后来还是苏联塔斯社工作人员，完全是革命队伍中人呵。可是，建国后，您为了集中精力于心爱的俄国文学翻译，拒不担任公职。那么，您有级别吗？现在，您算是离休干部吗？

盛天民：当然不算，草婴是体制外的。从解放后，他就没有单位，一直是个自由职业者，靠翻译、领稿费生活。也担任过一些社会职务，包括20世纪50年代末的《辞海》编委、外国文学分册主编啦，但都是不进编制的。他就是要求自由地从事文学翻译。上次央视做《大家》的访谈节目，主持人了解情况后就认为他是“三无

人士”，从解放以后他基本处于无工资、无编制、无职称这样一个状态。

作者：我们也看了那一期的《大家》节目，看到央视主持人借用了王西彦先生评价草婴翻译精神的一个提法，就是“有一种忘我的虔诚态度和傻子精神”。傻子精神，本质上是一种崇高的事业心吧。节目里还谈及“文革”结束，上海市委宣传部的领导请草婴出山，担任译文出版社的总编辑，您仍坚辞不就。准备“傻”到底啦？

草婴：出版社要我去做总编辑，我考虑下来，我如果担任了这个行政工作，我就没有更多的精力来从事翻译工作了，所以就谢绝了。

我这个人想法比较简单。我认为正确的，就把全部精力、时间都放到这上面去，其他事情一律都推掉。从18岁开始，我首先考虑的就是有限的精力、时间，怎么能够用在对社会、对人民最有益的工作上面。这是我一贯的宗旨。我因此最重视时间。我对时间的吝啬，也可以说节约，像犹太人节约他的金钱一样。

说“傻”，也对。因为我一辈子做的都是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花了很大力气，人家不一定能理解。很多人不愿意做这样的“傻”工作，我却照做不误。但也可以说不傻，反正我活着就做了我认为最应该做的事情。

作者：您的翻译事业集中于俄罗斯文学，是如何考虑的？

其实，我们查阅了一下您的过往历史，在上海念的倒是一家英国人办的中学——雷士德学院。英美这些国家不是更加强大、先进？学好英语在职业前途上不是会更顺当些吗？

草婴：是呀，那时候学英语是潮流。当然，这也很有用，很好的。但我，想法有些不同。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那年我14岁，12月随家人避难上海。面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我很郁闷，很气愤，开始阅读各类进步书籍。当时的苏联是进步的象征，从一些文学作品、新闻通讯看苏联，那真是个充满光明和希望的国家。我就有一种强烈的愿望，要学好俄文，要把这些翻译过来，传播出去，让我们也一样发展、壮大，让中国老百姓不再受苦。当时翻译苏德战争新闻通讯是这样想的，后来翻译肖洛霍夫、托尔斯泰的作品也是这样想的。

作者：您最早翻译的是肖洛霍夫的作品吧？

草婴：还不是。翻译的第一篇俄罗斯小说是普拉多诺夫的短篇小说《老人》，当时刊登在《苏联文艺》杂志第二期上，那是1942年。后来才翻译了肖洛霍夫的《学会仇恨》。我含着悲愤翻译这些作品，进一步增加了对法西斯的仇恨。

作者：您翻译肖洛霍夫作品，比翻译托尔斯泰作品还早些，是吗？为何那么热爱肖洛霍夫？

草婴：20世纪50年代，我主要翻译肖洛霍夫的作品，包括《被开垦的处女地》（现译为《新垦地》）、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和《一个人的遭遇》等。我为什么翻译肖洛霍夫的小说？当时苏联社会发生很大变化，文艺界也出现了新的局面，批判个人迷信的文章源源不断地出现在苏联报刊上，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渐渐明白，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强调人对人的恨，而需要弘扬人对人的爱。我深深感到文艺作品首先要关心人，关心人们的苦难，培养人对人的爱，也就是人道主义精神。托尔斯泰是最伟大的人道主义者。巴老曾评价说，托尔斯泰是19世纪俄罗斯的良心。而肖洛霍夫，被公认为托尔斯泰在思想和艺术上的继承人。

当年对肖洛霍夫的评价也是有分歧的，有人批评他反对阶级斗争理论，宣扬人性论，不是社会主义作家。在中国，当时同样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但我通过反复阅读肖洛霍夫的作品，完全肯定他是最伟大的苏联作家，他的作品应该首先介绍给中国读者。

作者：哦，后来才是翻译托尔斯泰作品。听说您是国内唯一翻译了全部托尔斯泰作品的人？

草婴：不是。我只是翻译了全部的托尔斯泰小说，那是从五十岁以后开始着手的，花了二十多年。至于其他的，如诗歌、散文等，就来不及翻译了。托尔斯泰的作品，无比地丰富浩瀚呵。

作者：我们注意到，《浙江日报》记者任琦在采访通讯中曾经记载，您于1941年~1945年间在塔斯社上海分社工作，并且和分社的社长亦即后来著名的汉学家罗果夫面对面办公，成为好朋友。通讯认为，您由此对于俄罗斯人的性格有了深入的了解：“中国人和俄罗斯人打交道会感到比较有共同语言。为什么呢？大部分俄罗斯人都是相当豪爽的，怎么想怎么说，思想开放。这和英国人不一样。另外，中俄有着一些共同的历史背景。像俄国有过长达九百年的沙皇统治，中国有着漫长的封建专制，所以在反封建专制上两国人民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感受，特别容易互相接受，互相理解。”这些记载，准确吗？

草婴：准确，是我的原意。我当时对任琦，以及在其他场合都说过，俄罗斯文学中的人道主义、苦难意识，对人的精神世界细致而深刻的探索以及现实主义的表现手法，滋养了中国文学。我还说，俄罗斯文学和他们的土地一样，比较广阔。考虑的不仅是一时一地、一个家庭的问题，而是整个民族，乃至人类的精神向度。这样

一种“阔大”的传统对中国现当代文学有影响。

作者：除了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您还翻译了很多苏俄作品。尤以1955年翻译的苏联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小说《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影响最大。据介绍，先是在《译文》上刊登，由于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的推荐，得以在当时发行量达到三百万册的《中国青年》杂志上连续两期转载。接着又印单行本，发行量打破了翻译小说印数的记录。因为“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小说的主人公娜斯嘉成为青年学习的榜样。您翻译这部小说，是因为赞赏娜斯嘉吧？您如何评价娜斯嘉形象？

盛天民：当时的确热闹。这本书成为团中央指定的必读书籍，国内很多杂志都对它作了推荐，而且在各地都举办学习娜斯嘉的报告会。他也被邀请到本市几个地方，还有南京，都去作过报告呢。

草婴：我的确喜欢这部小说，赞赏娜斯嘉形象。但如何评价，还是得听取公论。

作者：评论家认为，自您翻译出尼古拉耶娃的《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后，才有紧接着的“百花文学”。这也就是新时期出版的《重放的鲜花》一书里面那些作品，它们都是围绕着“关心人民疾苦，反对官僚主义”这个主题的。尤其是娜斯嘉形象——我们现在来看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里面的主人公林震正是一位处处以娜斯嘉为精神楷模的青年人。他去报到时随身带了一本《拖拉机站站长和总农艺师》，还在书的扉页上写了“我要做娜斯嘉那样的人，像娜斯嘉那样生活”这样的话。章海陵认为，王蒙等人的这些作品不同于茅盾、老舍和巴金的传统，也迥异于丁玲、萧红和张爱玲的创作，显示了现实主义的新魅力。“今天‘改革文学’在中国已成为奔腾大河，草婴当年挑选俄文原作的敏感及灵动的译笔，是否就是河源冰川的第一滴水珠呢？”对此，您怎么看？

草婴：这也要听大家的。我说不出什么来。

作者：后来，在“反右”严重扩大化中，这些“百花文学”或曰“改革文学”的作者都吃了大苦头。您当时怎么样，没错划吧？

草婴：我倒是幸免。开始也紧张了一阵子。后来，因为是翻译嘛，不是创作，就没有追究下去。

作者：说到翻译，20世纪30年代翻译界有过争论，就是有人认为鲁迅的翻译死扣原文，是“硬译”。您怎么看？

草婴：不对。我看鲁迅的翻译是极好的。要说文学翻译的“信达雅”，这三点他都做到了。

盛天民：他是最崇拜鲁迅的。

作者：您从少年时期起就读鲁迅先生的书，而且十分崇拜鲁迅。您说过，一生中受鲁迅的影响最大，是吗？

草婴：是的。抗战初期，国内首次出版了《鲁迅全集》，共20卷，定价20元，但预订只要8元，于是我就预订了一套。当时我还是个中学生，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支出呵。那时一个普通职员的月工资才二三十元。家里每个月给我5元零花钱，我大部分用来购买进步书刊、学习俄语。

有了《鲁迅全集》后，我就反复读，并在同学中间传阅。我上学骑一辆自行车，自行车的兜里常常放着《鲁迅全集》。《鲁迅全集》中就包含鲁迅的翻译作品，可以说，我后来走上文学翻译的道路，最早是受了鲁迅的影响。

作者：从以往报道里看到，中学时期您一直是班长，以致有个绰号叫“船长”。您的同学里还出了不少名人吧？

草婴：我的同班同学里有梁于藩（原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鲁平（原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任溶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汤兴伯（原中国驻纽约总领事），还有水电部高级工程师邱长清，解放军工程兵学院的教授汪礼彤，等等。

作者：您为什么一直把鲁迅的作品视为“最重要的生活教科书”？

草婴：我认为，鲁迅站得高、看得远，他是中国20世纪最伟大的文化巨人。他的作品无论涉及哪个领域，其目的就是改变中国社会的现状，改变中国人的命运。鲁迅翻译俄罗斯、日本以及东欧一些弱小民族的作品，这些民族也与中国人民一样饱受封建专制的奴役。鲁迅从事翻译工作，就是借“他山之石”来鼓起中国民众反封建的勇气，以此提升全民素质。

作者：是呀，鲁迅精神也一直熏陶着您。

被您的翻译作品“感动了几十年”的作家冯骥才，写过一篇《草婴先生》。文章里有一段话点出了您这一代文学翻译家的使命：翻译家的工作不是“搬运”别人的作品，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或技术性很强的职业。它可以成为一种影响社会、开启灵魂、建设心灵的事业。

除了鲁迅，您还讲过，巴金对您也产生过很深的影响。

草婴：我年轻时阅读了大量进步刊物，其中就刊登着巴金、鲁迅和茅盾等人创作的优秀作品。巴金写过一篇《沙丁》，反映煤矿工人的苦难生活，他对劳动人民深深的同情和最真挚的爱，令我十分感动。巴老在翻译上的成就也很高。一些他几十年前翻译的作品，特别是高尔基的短篇小说，放到现在来看，还是无人能出其右。

作者：您对知识分子的良知进行过精辟而形象地阐述，非常生动。

草婴：良知是心，是脑，是眼，是脊梁骨，是胆。“心”是良心，做人做事都要凭良心，要是没有良心，什么卑鄙无耻的事都可以做。“脑”是头脑，不论什么事、什么问题，都要用自己的头脑思考、分析、判断，也就是遇事都要独立思考，不能人云亦云。“眼”是经常要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社会，观察人民的生活，要随时分清是非，尤其是大是大非。“脊梁骨”是人活在世上总要挺直脊梁，不能见到权贵，受到压迫，就弯腰曲背，遇到大风就随风摇摆。“胆”是勇气，人如果没有胆量，往往什么话也不敢说，什么事也不敢做。

作者：总之，踏踏实实，堂堂正正，这就是您做人的准则，对吗？

草婴：是的。小时候，我经常跟着当医院院长的父亲到农村为农民看病，渐渐地我懂得了一个人要有爱心，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在我心里扎下了根。

后来，我搞文学翻译，符合我的价值观的就做，不符合的就不做。我把名和利看得很淡。前些年有文件规定，早年在《时代》出版社工作的可以申请享受离休待遇，可我没有申请。没有单位没有工资，我在选择翻译选题上可以更自由些。

作者：您现在是否有退休金？

草婴：没有。我是“三无”人员嘛。不过后来聘任我为上海文史馆馆员，每个月有两千多元“车马费”。呵呵。

我这一辈子就只想做好一件事：文学翻译。我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作者：您坚守着信念，坚守着正直。著名翻译家满涛、傅雷受到不公正的批判时，您没有落井下石。

草婴：我对满涛和傅雷还是了解的。我在塔斯社工作时，傅雷也经常通过收听法语广播翻译一些苏德战场和国内解放战争的报道。他当时居住在石门路上的巴黎新村。我常常到他的家里去取译稿，然后交给姜椿芳，由他提供给塔斯社上海分社的电台或报刊。

傅雷是位非常严肃认真的翻译家，同“反革命分子”联系不起来。满涛也是很

好的，优秀人才呵。我对满涛和傅雷从没写过任何的批判文章。

作者：哪怕当时您受到了不小的压力，还是坚守着良知。

草婴：是的。

作者：您在很多场合以及自己的文章里提到，姜椿芳是您从事翻译工作的领路人。十年浩劫后期，含冤被监禁的姜椿芳出狱后，你们还有一次不寻常的会面吧？

草婴：哦……“文革”时他被关到北京秦城监狱里，关了六年零八个月，1975年下半年才放出来。他写信给我，问上海有没有地方让他休养。我告诉他，你来好了，就到我们家里挤一挤吧。1976年9月9日上午，工宣队宣布：今天有重大消息发布，任何人不得请假，不得离开单位。可下午5点，姜椿芳乘坐的船从青岛抵达上海，如果我不去接，他就找不到我的家。后来我灵机一动，悄悄地开溜了，没有跟任何人说一句，也不让任何人注意。下午4点，广播里传来消息，毛泽东逝世！原来如此。到了虹口码头，轮船准时到达，姜椿芳在夫人和两个女儿的陪同下从船上走下来。看到他十分虚弱，人也苍老了很多，我心里很难受。

晚上，我们全家稍微准备了一些酒菜欢迎他，把窗帘一拉，悄悄地吃了一顿饭。

作者：这又得冒不小的风险。

草婴：是的，要是被别人看见，误认为我们在大吃大喝庆祝，真不得了。他前后在我家住了一个多月。

作者：翻译是很辛苦的事业。您现在身体好的时候，还翻得动吗？

草婴：身体好的时候每天还能读书、写作，四处散步。不过现在翻译不做了，就是整理以前的译文。

作者：您以前处于巅峰期每天可以译多少篇幅？现在有的译者两三个月就翻译出一本十几万字小说，您听说过吗？

草婴：以前的几十年，在翻译上我从没有中断过，365天每天都要翻译一点。但以定稿计算，我每天平均就只有一千字左右，我所了解的翻译家每天的翻译量都差不多这个量。对于现在有的译者的速度，我也能理解，靠翻译养家糊口很难，只能靠量了。但缺少了精益求精的态度，会妨碍翻译水准。

作者：有人描述道，草婴先生选择了一条寂寞艰难的道路，这条路很长，很